

Culture and Poetics

文化与诗学

中西文论与文体研究

2018年第1辑 总第26辑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〇编

李春青 赵 勇 〇主编

李春青 〇执行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文化与诗学

中西文论与文体研究

2018 年第 1 辑（总第 26 辑）

主 编：李春青 赵 勇

执行主编：李春青

编 委：曹卫东 陈太胜 陈雪虎 程正民

方维规 彼得·芬沃思（Peter Fenves）

郭英德 季广茂 李春青 罗 钢

吕 黎 钱 翰 陶东风 王一川

塞缪尔·韦伯（Samuel Weber）

姚爱斌 张永清 张政文 赵 勇（按音序排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文论与文体研究：文化与诗学 / 李春青，赵勇主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5675-8447-1

I. ①中… II. ①李… ②赵… III. ①文学理论—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②文体—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I0-03 ②H152 ③H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6751 号

文化与诗学·2018 年第 1 辑 (总第 26 辑)

主 编 李春青 赵 勇
执行主编 李春青
责任编辑 任红瑚
封面设计 淡晓库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6 开
印 张 20
插 页 1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8447-1 / G·11574
定 价 65.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西方诗学与文化研究

- 弗·雷·利维斯文化诗学批评的四个文化主题·····陶水平 002
- 但丁《神曲》中的诗性正义·····耿波 史圣洁 041
- 诗性逻辑、历史的转义模式与反讽
- 论维柯对思维与实践的诗学重构·····匡宇 062
- 双重书写与文学史的生成：耶鲁学派的文学史理论·····戴登云 081
- 德国汉学中的中国形象建构问题研究·····周建萍 111
- “为了一种新电影”：阿兰·罗伯-格里耶的电影美学·····王长才 130

中国古代文化与文论

- 至高之法，不离言相，超言绝相
- 般若学言意观谏论·····袁晶 148
- 从朱熹诗作之抵牾看诗与思的逻辑冲突·····刘思宇 167
- 陶渊明“自娱”文学观探论·····赵红梅 190

中国古代文体问题

“文”“体”之间

——中国古代文体学基本概念的界说与证释·····陈民镇 208

“怨”的文体实践与文论认证·····袁 劲 234

青青河畔草

——萌芽时期五言诗的文体内容研究·····贡巧丽 249

纪昀的小说文体与乾嘉学术·····梁结玲 265

《红楼梦》两次“借剑杀人”法之同异比较与影子叙事

——兼论夏金桂为王熙凤之影子副册·····任竞泽 281

从政事之训到家教之训

——文体学视阈下的“训”体发展·····罗 柠 吴中胜 297

编后记·····313



西方诗学与文化研究

弗·雷·利维斯文化诗学批评的四个文化主题^[1]

陶水平^[2]

〔摘要〕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是对以利维斯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文学批评的超越，因而探究利维斯的文学批评对于认识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认为，利维斯的文学批评具有文化诗学批评的学术特点，主要围绕以下文化主题来展开，即：一，弘扬少数人文化，抵御大众文明；二，培养文学阅读和认知，拯救传统有机社会的解体；三，确立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抵御技术功利主义；四，重视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高扬人文主义传统。利维斯的文学批评并非后来新批评那样的纯文学批评，而始终是文化批评。虽然利维斯对大众文化持激烈的批评态度，但这恰恰从反面激发了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肯定；而且，利维斯率先用文学文本细读法解读大众文化文本，在研究方法上给伯明翰学派以直接启迪。要之，英国当代文化研究正是对利维文化诗学批评的对话、突破和超越。

〔关键词〕 利维斯 文化诗学 少数人文化 大众文化 有机社会 文学批评 生活批评 批评标准 文学教育

[1] 本文系作者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跨学科研究与文学理论新形态：文化研究的历史语境和理论建构》的部分成果。项目立项号：09BZW002；项目鉴定书号：20161106。全书五十万字，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2] 陶水平，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中心兼职研究员。

一、引言

弗·雷·利维斯 (Frank Raymond Leavis, 1895—1978), 英国现代著名文学批评家, 剑桥文学批评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出生在英国剑桥一个做钢琴生意的小商人家庭, 曾就读于著名的佩斯私立中学, 受到良好的古典语文学教育。1913 年利维斯以优异成绩获得剑桥大学奖学金进入伊曼纽尔学院学习历史, 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学业中断。利维斯入伍参战, 战争期间曾担任英军救护队的担架兵, 自称带着唯一的一本小书《弥尔顿诗集》上前线。^[1] 战争结束后于 1919 年回到剑桥伊曼纽尔学院重拾学业。由于对文学有强烈兴趣, 第二年转入剑桥新成立的英文学院。此时, 瑞恰兹等人正执教于剑桥英文学院, 利维斯遂成为其学生, 瑞恰兹后来还成为利维斯妻子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而且, 在博士毕业留校工作之后, 利维斯还聆听过瑞恰兹给本科生开设的“实用批评”的系列讲座。在剑桥读书期间, 利维斯深为叶芝、艾略特的诗歌以及艾略特的《神圣之林: 诗歌批评文集》(*The Sacred Wood: Essays in Poetry and Criticism*, 1920) 等作品叹服。1924 年, 在剑桥大学英文学院教授阿瑟·奎拉·库奇爵士指导下, 利维斯完成了题为《新闻与文学的关系: 英格兰报业的兴起与早期发展》(*The Relationship of Journalism and Literature: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in England Press*) 的博士论文, 该文先于后来美国学者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探讨同类话题, 主要是关于 18 世纪英国都市报业与小说关系的文学社会学研究。1925 年, 利维斯留校任剑桥大学英文学院见习讲师, 此后一生都在剑桥英文学院 (后改名为英文系) 执教。1929 年与志同道合的学生奎妮·多萝西·罗斯 (Queenie Dorothy Roth, 1906—1981) 结婚。1932 年利维斯被聘为剑桥唐宁学院英文研究主任, 1936 年, 成为剑桥唐宁学院院士, 翌年被剑桥英文学

[1] 见陆建德:《弗·雷·利维斯和〈伟大的传统〉》, 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 中译本序, 三联书店, 2002 年, 第 3 页。乔治·斯坦纳在一篇评论利维斯的文章中列举了一长串被利维斯得罪的名字, 对这位不通世故、棱角分明、激情四射的天才表示由衷的理解和敬佩。见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 第 268—269 页。

院聘为正式讲师。在利维斯所处时代，英国文学批评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占据英国高校人文学科主流乃至英文系中心的仍是传统的古典学（classics）和语文学（philology）。课堂上，利维斯是一位思维新锐、特立独行的英文教师：一方面挑战权威、挑战主流，把当时的伦敦文化界强势集团作为批评锋镝的靶标；另一方面敢于在课堂上讲授当时被视为禁书的《尤利西斯》，讲授当时还是剑桥英文系学生的燕卜逊的诗歌，赞赏劳伦斯的小说。利维斯个性鲜明、一生好辩，臧否人物，虽深受学生欢迎，却不为同行认可，处于剑桥大学的边缘位置，穷其一生也未能晋升到教授一职。^[1]1962年，利维斯从剑桥英文学院高级讲师任上退休。“博士”成了利维斯的终身头衔。^[2]后期利维斯体现了从艾略特式的古典主义向新浪漫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转变。利维斯还曾被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荣誉会员，被英国多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1978年，利维斯逝世并被女王授予荣誉勋位，同年剑桥大学出版社重印其主编的《细察》20卷。利维斯一生笔耕不辍，在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期间，累计著有近30部专著和超过100篇评论文章。代表作有《大众文明和少数人文化》（1930）、《劳伦斯》（1930）、《英诗新方向》（1932）、《如何教授阅读》（1932）、《文化与环境》（1933，与学生合著）、《英国近代诗歌再评价》（1936）、《伟大的传统》（1948）、《小说家劳伦斯》（1955）、《安娜·卡列尼娜及其他论文》（1967）、《我们时代中的英国文学和大学》（1969）、《小说家狄更斯》（1970，与夫人合著）、《活的原则：作为思想训练的英文专业》（1977）等。与瑞恰兹、燕卜逊常年在国外任教不同，利维斯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剑桥。他通过著书立说、批评实践、教学演讲、学术争鸣和创办刊物，为建立一个文化有机体（文学有机体或知识有机体）社会而奋斗。利维斯还将其在剑桥大学英文系的人文教育思想、文学理念和

[1] 陆建德：《弗·雷·利维斯和〈伟大的传统〉》，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中译本序，三联书店，2002年，第2页。

[2] 乔治·斯坦纳在一篇评论文章中盛赞利维斯使“博士”这个平庸的学衔成为自己名字的一部分。缪斯女神只授过两个人博士学位，一个是约翰逊，一个是利维斯。见乔治·斯坦纳：《F·R·利维斯》，见《语言与沉默》，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60页。

批评理论推向学院之外的社会文化实践，创办了《细察》（*Scrutiny*，1932—1953）这个文学和文化批评杂志。利维斯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创办的《细察》杂志，这是利维斯夫妇变卖家里的房产来创办并维持二十余年的著名刊物。该刊“作为一个抵抗大众庸俗诉求和新兴的低劣文化劝诱之阵地”，旨在“拯救昔日之遗风”（霍尔语）。《细察》期刊由利维斯夫妇主导，剑桥英文系学生和青年教师为编辑部成员，撰稿人除利维斯及在校学生之外，还吸引了大批批评界名家，很多重要的、新锐的、原创性的文学理论和批评研究成果都是首发在《细察》杂志上，尽管刊物无力给这些重要论著的作者支付稿费，但这并未妨碍这些作者给予杂志的持续支持。利维斯所主编的《细察》期刊虽然主要关注文学，但其批评的对象已经超出了文学研究。在《细察》创办的21年间，其编辑团队和作者成员来自文学、艺术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表了150多位作者的文章，显示其文学批评的深切社会关怀和宽广的文化意识，对后来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产生了直接的激发作用。利维斯通过《细察》培养了很多文学青年（包括一支相对稳定的评论家队伍和一批忠实的读者），很多就读于剑桥英文学院乃至其他高校的文学学子正是在阅读《细察》的过程中逐渐成长为批评家。利维斯也是当时英国思想界、时事界的一位著名评论家，参加了一些重要的文化论争。20世纪30年代，利维斯还与重返剑桥三一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维特根斯坦过从甚密，后者是利维斯家中的常客，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音乐、语言和哲学等问题。利维斯从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两个方面展开学术研究，既关注语言和细读，更关注文化和价值，开拓了英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多个新维度，具有文化诗学批评的特点，真正推动了英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学科化。利维斯虽然在剑桥大学学院内并未居主流，但在广大青年学子当中却有超高人气。利维斯以其人格魅力与文学批评的才华吸引了大批青年作家和青年学子，很多人因此成为利维斯主义者。利维斯率先把研究目光投向现代媒介及大众文化，把以前用于研究高雅文学文本的分析方法运用到大众文化研究上。利维斯和《细察》批评集团对于文学与语言、社会、历史和传统的复杂关系的关注，直接成就了后来的伯明翰学派，为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开辟了道路。利维斯的文学批评

具有文化诗学批评的学术特点，具体围绕以下文化主题来展开。

二、弘扬少数人文化，抵御大众文明

利维斯继承了阿诺德等人以来英国近代“文化与文明”对立的文化主义学术传统，强调精神文化与物质文明（及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的对立。利维斯登上学术舞台的20世纪30年代，距离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问世已经过去了约60年，英国社会发生很大变化，英国工业文明的技术化、商品化程度比阿诺德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英国现代化由盛而衰，机器文明造成英国社会和传统文化全面解体，报刊、广告、流行小说、电影、广播等现代媒介文化更为兴盛。在《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 1930）一书中，利维斯强调了大众文明（大众文化）与少数人文化（精英文化）的对立。该书开篇即引述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的一段文字：

文化为人类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在现代世界，这种职责有其特殊的重要性。与希腊罗马文明相比，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在文明，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愈演愈烈。^[1]

利维斯敏锐地意识到，机器正在以无与伦比的速度改变生活习惯和生活环境，技术功利主义造成人的智性、精神及文化生活的缺失，导致英国社会的解体和英国传统文化的解体。由英国工业革命前的那种有机的共同文化一分为二：一种是少数人掌握的精英文化；另一种是与之对立的大众文明。利维斯认为，少数人的文化体现为“思想和谈吐的精华”（the best that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凝聚在伟大的文学传统之中。与之相对的是多数受教育层次较低的社会大众所消费的通俗文化，如报刊、广告、流行小说、广播、电

[1] 转引自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译文参考《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11页。

影等。利维斯将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对立转换为“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的对立。尽管利维斯在本书中使用的“大众”一词比柯勒律治的“暴民”与阿诺德的“群氓”要更为客观、温和，但其思维方式仍是典型的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利维斯试图以文学经典拯救大众文明。

在利维斯看来，“文明”与“文化”日渐成为意义相反的词。机械文明主导下的大众文化体现的是技术功利主义价值，与传统文化相脱离、相抵牾。文化是精微的，幸存的“少数人文化”是对“大众文明”的疗救。利维斯在该书中对少数人“文化”作了如下界定和表述：

在任何时代，具有洞察力的艺术欣赏和文学欣赏都依赖于极少数人：只有很少的人能够不经提示地作出第一手判断（作品通俗易懂的情况除外）。能够带着真正的切身体会认同这第一手判断的人数量较之前者要多一点，但是仍为少数。普遍公认的价值判断是某种纸币，其基础是比例很小的黄金。在任何时候，美好生活的可能性都与这种货币的状态密切相关。……少数人不仅有能力欣赏但丁、莎士比亚、多恩、波德莱尔和哈代（这里只列举几位大人物），而且有能力认出他们最近的继承人，这些人在特定的时代建立起了民族意识。因为这种能力并不仅仅属于一个孤立的美学领域，而且也包含了对理论、艺术、科学和哲学的敏感度，而这些可能影响对人类境遇和生命天性的感觉。少数人保存了传统中最精致、最容易毁灭的部分，正是仰赖他们，我们才有能力从对过去的最美好的人类经验中获益，安排一个时代的美好生活的固定标准才得以确立，才有了这个比那个更有价值，这个方向而不是那个方向更为可行，中心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的感觉。使用一个引人深思的隐喻（同时也是转喻）：他们保存了美的生活赖以存在的语言、变化的习语，没有这些，精神就会失去特性、支离破碎。我用“文化”来表示这种语言的使用。……文化正处于危机之中。^[1]

[1] F·R·利维斯：《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节选），李媛媛译，见汝信主编《外国美学》第二十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60—361页。

显然，在利维斯看来，文化的精华保存在少数人创造的优秀艺术尤其是文学艺术之中。这些少数人的艺术创造不仅属于一个孤立的美学领域，而且包含了各门人文学科的人文思想，保存了各个特定时代的人们生活经验和语言的精华。正是这些少数文学精英的创作建立起了特定时代的民族意识和价值标准。然而，民族文化传统中这些最精微也最易消亡的部分正在遭受大众文明的挤压而陷入支离破碎，精神文化因而陷入危机之中。利维斯认为，优秀文化传统历来由少数精英人物加以保存和传播，使得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生活保持人类生命天性并具有价值标准。反之，机械文明带来大众文化生产的批量化、标准化和平庸化，带来了技术功利主义思潮与大众文化的盛行，造成对阅读和写作的威胁以及大众读物的泛滥，导致传统价值标准被颠覆及文化标准之下降，进而导致当代文化的堕落和衰微。大众文明是一种机械文明、技术文化和现代媒介文化。相对于强大的大众文化，少数精英文学反而成了弱势文化。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的对立其实就是现代大众媒介文化与传统语言文化的对立。利维斯尖锐地指出，英国文化正处于危机之中：标准化的文明正迅速包围整个世界，文化的前景极其暗淡。^[1]利维斯对电影的批评尤为苛刻，批评“它们在当今文明化的世界中成为向最廉价的情感诉求提供娱乐的主要形式；并且在感受力处于催眠状态时，由于同栩栩如生的实际生活的幻象联系在一起，它们迎合了最廉价的情感诉求，投合了较为阴暗的部分。……如此刻意地发掘低级反应成为我们文明的特征，想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说，对应用心理学的史无前例的运用已成为一个新的历史要素”。^[2]

利维斯认为，大众文化中语言的滥用与堕落是文化衰退的重要征兆。大众文明时代广告对语言的滥用成为一时风尚，给传统语言和文化造成极大

[1] F·R·利维斯：《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节选），李媛媛译，见汝信主编《外国美学》第二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67页。

[2] F·R·利维斯：《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节选），李媛媛译，见汝信主编《外国美学》第二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61页。

伤害，导致了语言的标准化的，造成符号的膨胀与有价值信息的减少。大众媒介文化的泛滥消解和中断了传统文化所珍视的感觉方式、思想方式与表达方式。利维斯尖锐地指出：现代人比华兹华斯生活时代的文化环境更加糟糕，因为现代社会的符号泛滥淹没了优秀文学文本，使得读者难以分辨和思考。在华兹华斯生活的年代，“一位读着华兹华斯长大的读者游走于一套有限的所谓符号之间：变体并非铺天盖地。因此当他一路读下来就能够获得辨别力。但是现代人遭遇了一大堆的符号，变体之多、数量之巨，令人困惑，除非极具才华和天赋，否则几乎无法着手甄别的工作。此时，我们已在经历总体性的文化困境。界标在不断变动、不断增进、彼此挤压，差别和分别已然模糊，……人们要确定他是否了解自己正在谈论的东西正变得越来越困难。”^[1] 因此，为了提高社会大众的文学鉴别力，使之能够在各种读物泛滥的作品海洋中分辨良莠，利维斯开始了其文学批评和文教育的学术工作，努力实现其以传统精英文化教化民众、抵御大众文明或大众媒介文化的文化使命。

利维斯认为，传统文化式微与大众文明泛滥的根源在于现代工业时代对技术的崇拜与对功利的追求，因而他激烈地抨击了以边沁等人为代表的技术功利主义。在《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一书中，利维斯对批量生产并大量进入英国的美国文化提出了批评，认为美国是技术功利主义社会的典型例子，美国文化是技术文化的化身。利维斯指出：“如今，当我们考虑出版形式中大众产品的标准化的过程，显而易见存在灾难的后果，即伴随而来的是低水平同化（levelling down）的过程。”^[2] 电影、广告、报刊、流行小说、广播等大众文化泛滥，挤压了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生存空间，带来了文化生产的标准化、平庸化、水准下降与文化权威的消失，割断了当代与传统的联系，导致传统文化的消解。在利维斯看来，“这显然带有凶险的意义”。大众

[1] F·R·利维斯：《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节选），李媛媛译，见汝信主编《外国美学》第二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64—365页。

[2] Leavis, F. R. *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 1930, p7. 转引自马克·J. 史密斯：《文化：再造社会科学》，张美川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文化的泛滥会使精神领域也受制于“格雷欣法则”，造成高雅文化不断被劣质文化所驱逐。^[1]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利维斯对诗的感官细节的关注，除了其他原因，也反映了他对工业秩序的敌视，因为他感到，这是被抽象和实用所主宰的秩序”^[2]。

面对大众文明的泛滥与传统文化的解体，利维斯一方面尖锐指出大众文明的严重危害，一方面将文化拯救的希望寄托在与之对立的“少数人文化”身上，因为少数人作为最优秀的文化精英，他们传承和保存了最优秀的文化——最精微的经验、思想和语言——它们构成伟大的文学经典和文学传统。利维斯高度重视和强调了语言对于文化的重要性，不遗余力地试图以此拯救大众文明。在利维斯看来，传统价值的连续性有赖于少数人文化加以维系，少数人文化是对大众文明的疗救。传统文化的精华、先辈们的精微的生活经验、精微语言及价值标准，最鲜活地保存在历代优秀语言艺术即文学作品之中。文学既能够与鲜活的现实生活经验相联系而使语言保持活力，又能够延续传统文化精华而恢复人们对过往经验的再体验。反之，粗俗泛滥的大众文化则误用语言、滥用语言。利维斯对当时英国的大众媒体如《泰晤士报·文学副刊》、BBC 电台第三套节目等表示极大的轻蔑。利维斯主张，尤其要对媒体从业人员进行文学教育，培养、端正和提高他们的文化标准和审美趣味。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利维斯非常公开地支持文化标志，将文化视为生活的艺术或生存的艺术，视为谴责技术化边沁主义文明的武器。在利维斯看来，“文化曾属于道德范畴，在面对堕落的文明时，唯一的拯救方法与确认依据可以从那些有某种非凡创造精神的人里找到，那些人大部分都是作家，如莎士比亚、布莱克、狄更斯、劳伦斯等，他们作品中散发出的活力和洞察力能够浇灌已被实利主义烤干的灵魂，并能在黑暗时代促成这些灵魂的复苏。”^[3]利维斯《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以高雅文学对抗大众文化，开大

[1] F·R·利维斯：《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节选），李媛媛译，见汝信主编《外国美学》第二十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62、368页。

[2] 特里·伊格尔顿：《如何读诗》，陈太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3] 弗雷德·英格里斯：《文化》，韩启群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7页。

众文化批评之先声，与法兰克福学派异曲同工，甚或直接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当然，利维斯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媒介文化文本的批评也从反面引发了伯明翰文化研究的兴起。

三、培养文学阅读和认知，拯救传统有机社会的解体

三年后，利维斯在与学生邓尼斯·汤普森（Denys Thompson，亦为《细察》编辑部重要成员之一）合著《文化与环境：批评意识的培养》[Culture and Environment: 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 1933]一书。该书进一步将“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的对立，转换为城市文明环境与乡村社区文化生活的对立、工业机器文明与农业有机传统的对立，深拓为“现代工业社会”与“传统有机社会”的对比研究。利维斯悲叹工业文明的进步，怀念前工业时代的有机社会。利维斯以“有机社会”（the organic community，或译为“有机社区”“有机共同体”）这一术语来指称17世纪的英国乡村社会，并以此反衬20世纪英国机械文明和工业社会之弊。《文化与环境》开篇就是这样一种眷恋与无奈的文字：“文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替代物，我们失去的是有机社会及其代表的生活文化。民歌、民间舞蹈、科茨沃尔德的村舍以及手工艺品是代表更深层东西的符号：一种生活的艺术、一种有序有范的生活方式，它涉及社会艺术、交谈的密码，它源自远古的经验，是对自然环境和岁月节奏的因应调整。”^[1]利维斯认为，工业革命前的乡村英国是一个体现了鲜活文化的有机共同体社会，文化即是这种乡村有机社会的生活艺术、生存艺术或生命的艺术。有机社会的文化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共同体文化，工业革命则使之解体。利维斯和汤普森依据英国作家斯图尔特《乡村变迁》的研究，以满怀忧愁的笔触写道：“旧英国是有机的共同体的英国。……那个有机的共同体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它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

[1] F. R. Leavis, Denys Thompson: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 p. 1—2, 转引自孟祥春《利维斯的文化理想研究》，《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消失了，要让人们（不管其受教育的程度有多高）了解它是什么样的事物，是一件普遍公认的难事。它（在西方）的毁灭是近代历史最重大的事实——确实是非常近的历史。这个重要的改变——这个巨大而惊人的解体——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中发生的？这个改变的过程就是这样，通常地被作为进步被描述。”^[1] 利维斯等人认为，传统有机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人际之间和谐相处的整体性社会，人们的语言鲜活、生动而充满活力、人们对感受力敏锐且心智健全，文学艺术雅俗共赏，真正体现了文化的自然生长，体现了人的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利维斯这样描绘那个有机社会：“斯图尔特笔下的村民依据自然环境来表达他们的人性，满足他们的人性要求；他们制作的東西——小屋、谷仓、麦堆和马车——连同他们的人际关系，构成了一个与自然环境同样适当而且是势所必然的人类环境，以及调整和适应上的一种微妙。”^[2] 它们构成乡村社会的生存艺术即传统文化。在这里，民间歌舞、小木屋甚至手工艺品都是文化的述说，成为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交流的标志，成为利维斯心目中的文化理想和文化标准。然而，工业革命以来的都市文明和机械文明则日益消解这个传统的有机社会，造成人性和情感的破碎，造成精神文化传统的解体。利维斯以 17 世纪的有机和谐的英国乡村社会反衬现代解体的英国工业社会，这体现了利维斯的文化衰退论的文化史观念，与艾略特和斯宾格勒的文化衰退论同调。

传统有机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语言的鲜活、丰富与创造性使用。利维斯表达了对 17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的传统有机社会的由衷赞美，强调了这个时期英国民族语言和共同文化的有机构成。17 世纪有机社会成为利维斯眼中英国史上最具活力的文化年代，认为正是那个时代的有机生活环境和鲜活语言环境产生了莎士比亚和班扬这样的作家，作家与那个时代的有机社会生活和语言有着血肉联系。利维斯认为，莎士比亚基于当时的社会生活经验和生活习语而创作，并通过创造性表达转而丰富了社会的语言与经验，因

[1] 转引自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吴松江等译，1991 年，第 331 页。

[2]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 London, 1933, p91, 转引自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吴松江等译，1991 年，第 332 页。